

对中国哲学源的重新思考

吾 淳

本文提要:本文旨在对中国哲学的发生问题作重新考察。这一考察依据如下两条定理:第一,观念先于文字。第二,观念不应来自观念。因此,中国哲学发生的时间起点应在三代之上的史前期,而其内容来源则主要是科学技术知识。全文包括(1)多样性或差异性观念的萌芽,此为五行观念的起源;(2)两极性或对立性观念的萌芽,此为阴阳观念的起源;(3)人与自然关系观念的萌芽,此为天人观念的起源;(4)涉及宇宙本质属性的哲学萌芽,其中包括了无神倾向、天道观念的起源。

中国哲学的发生或起源应当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长久以来,这一问题始终处于高枕无忧的睡眠状态,而它之所以能安然入睡就在于它实际上并没有被怀疑存在任何问题。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总论:关于中国哲学的起源

中国哲学的起源何在,目前普遍采取的看法是:

1. 在时间起点上,其始于商周时期。
2. 在内容来源上,其出自宗教天命观念。

当然,这样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合一的。

上述这样一种看法的固定化可能与对西方哲学的参照密切相关。同时,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对之也有深刻影响^①。

然而,这样一种观点现在看来似乎已有必要被重新审视和修正。

第一,关于中国哲学的时间起点。定理一:观念先于文字。

^① 如马克思说过:“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宗教领域内活动。”(《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册第 26 页)又如恩格斯也说过:“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致康·施米特(1890 年 10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84 页)

哲学发生之初具有观念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②例如目前通常认为《易经》具有哲学起点的意义,因为其具有观念性。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将一些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这就是哲学观念和具有文本形式(主要指文字,也包括某些符号)的哲学观念;哲学观念的萌芽形态和哲学观念的成熟形态。我们以往经常使用的一些观念意义的材料,如《易经》与同时代其它一些文本形式的哲学观念实际上是哲学观念期的成熟形态。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观念的发生应先于文字的发生,这即是说在此之前还应当有一个萌芽形态。换言之,中国哲学的起点比起目前普遍认为的可能要更为久远,它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为此,以下这样一个事实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即本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之后考古发掘所提供给我们的大量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清楚地向我们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我国约始于前6000年),原始先民的大量活动中,已经包含有或体现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早期哲学观念。许多目前看来在商周以后作为重要哲学问题或思想的内容,这时已经具备了某种原始雏型。例如对于多样性或差异性现象的观察,对于两极性或对立性现象的观察,对于天象及其规律性的观察,对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相互关系的观察,这时都已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些观念性的东西。而这些观念以后便分别被发展成为五行观念、阴阳观念、天人观念以及无神论与天道观等。这就是说,后世许多通过文本形式保留下来的能反映中国哲学面貌或特征的思想已能在更为原始的年代中找出它们的因子。

第二,关于中国哲学的内容来源。定理二:观念不应来自观念。

本世纪初以前,所能提供用于思考哲学起源问题的资料应当说是极其有限的。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才刚刚起步,一些具体学科,如考古学和民族学直到本世纪初才臻于成熟。因此,19世纪以前对于哲学起源的思考主要借助于展开的较早的宗教学研究。当时普遍认为:人类史前时期充满着宗教气息,是神秘一团。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或资料背景下,经典作家认为哲学起源于宗教也应当被认为是合理的。不过尽管如此,经典作家仍然更为本质地肯定: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

进入本世纪之后,考古学研究与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极其迅速。如前所述,在中国主要是50特别是7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已为认识人类史前状态提供了崭新的资料,通过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科学活动在史前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换言之,史前社会决非神秘一团。在这一时期,我们已可看到人类文明的晨曦。自然,哲学观念也在科学活动的温床上得到了哺育。例如:有关多样性或差异性现象的认识实际上是和广泛的采集活动密切相关的,有关两极性或对立性现象的认识实际是和大量的制作活动密切相关的。又如在大河村遗址和西水坡遗址中已提供了丰富的天文知识及其哲学观念,在大地湾遗址和河姆渡遗址中已经提供了深刻的建筑知识及其哲学观念。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宗教并不是哲学的唯一源泉,甚至也不是哲学的主要源泉。^③抽象首先应当来自于具体,而不是来自于抽象!

值得进一步补充指出的是,考古发掘事实上不仅直接为史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它也很有可能促使我们去重新认识对一些文本资料年代和内容的约定俗成的看法。例如《夏小

^② 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粗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姑且可称之为观念哲学时期,第二阶段姑且可称之为思想哲学时期。中国在商周以前应视为观念时期,春秋战国开始进入思想时期。

^③ 但这并不否认宗教仍是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源泉,同时也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宗教与科学在史前期有时很难严格地加以区分。

正》、《尧典》、《山海经》、《诗经》、《尔雅》、《黄帝内经》、《考工记》等等。也即是说,在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果中有许多内容可能是经历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时间遗传而至的,它们之所以被确定为某一时期的作品就在于它们在该时期取得了文本形式。并且,一些曾经被认为是非常神秘的东西或许并不神秘,它们之所以难以被理解可能仅仅在于我们今天还没有识读某些符号的特殊含义。当然,长久以来,已有无数学者曾对这些文本作过大量缜密的考证,在年代和内容的确定方面作了极有价值的工作。但是现在考古学的研究成就却有可能使我们在判断这样两个方面时作出更为大胆的假设。^④无疑,这必须是科学的。

一、多样性或差异性观念的萌芽

说起中国人的多样性观念,我们通常以《尚书·洪范》中的五行观念作为其起始点,并且我们还会迅速联想起史伯、晏婴等人的有关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物,物一无文”^⑤、“和如羹焉,齐之以味”、“声亦如味,以相成也。”^⑥似乎中国哲学中的多样性观念是出现于商周时期。现在看来,这样一种估计或判断是不适当的,或至少是不全面的。这就是因为《洪范》等文献中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观念只是多样性观念的一种较为成熟或晚近的形态。事实上,在这样一种形态之前还曾有过一个多样性观念发生发展的漫长过程。

依据目前已有的知识,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中国人对于多样性现象的认识起源得非常之早。这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与采集(包括渔猎)活动密切相关。因为采集活动与生存意义的生活最为贴近,所以其必然会成为多样性观念发生发展最直接最大量的源泉。而中国自然地理独特,生物群落丰富,这对于科学意义的采集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前提条件。根据大量的考古发掘得知,我国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遗骸和烧骨,并且与这些文化共生的动物种类也非常之多。如与西侯度人共生的动物化石有 22 种,与元谋人共生的动物化石有 29 种,与公王岭蓝田人共生的动物化石有 42 种,与余姚河姆渡人共生的动物也有 40 余种^⑦

采集活动的展开在意识层面至少导致了两种结果,即分辨与分类思维能力的获得和多样性观念的形成^⑧。事实上,这两种结果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侧面。目前,用作证明中国原始先民以采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思维和观念的材料主要仍依赖于《山海经》、《诗经》、《尔雅》等文献。但如前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文献中有许多内容应当是史前的。^⑨据统计,《山海经》中收有各种药物 130 多种,《诗经》中举有 200 多种植物和动物。《尔雅》的《释草》与《释木》篇中含有 100 多种草本植物和数十种木本植物,《释虫》篇计有 80 种动物。这样一种状况既可以理解为是思维的,也可以理解为是观念的,因为对于野生植物与动物的大量识别(其中已包含知识的

④ 民族学的研究也具有相似的意义。

⑤ 《国语·郑语》

⑥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⑦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有关条目。

⑧ 关于分辨与分类思维可参见拙作《影响古代中国发生期科学技术的若干因素》之一:采集活动对分辨、分类能力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第 4 期。

⑨ 已有一些学者对此作过论述。如李申就持相同观点,其以为《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遗存。见《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8、9 页。

累积)必然会导致多样性观念产生。而在识别的基础上,中国人进一步对采集对象作了分类^⑩。以《尔雅》为例,《释草》中将山韭、山葱、山蒜等排列在一起,属葱蒜类,《释虫》中把螟、蜚、蝼、蚘、蛭等排列在一起,同属蝉类。这样一种状况同样既可以理解为是分类的,也可以理解为是观念的,因为对于已识别的对象进一步加以归类(即包含对特征的把握)必然又会导致多样性观念由个别走向系统。以上由分辨能力导致的多样性观念可以视作较初始的形态,而由分类能力导致的多样性观念则可以视作较成熟的形态。而总的来说,在经过这样两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多样性观念已经是十分清晰和充实了。

当然,产生多样性观念的知识领域是十分宽泛的。例如经过漫长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先民肯定已经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材料之于工具或器皿形态的不同涵义。这时的工具或器皿形态至少已包括有石、玉、骨、角、蚌、竹、木、陶、铜等多种类型。

同样,每类工具式器皿又有许多样式构成。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中有甗型器、釜形鼎、钵形鼎、罐形鼎、双鼻壶、宽肩壶、背壶、高柄杯等不同样式。而良渚文化的玉器中也有琮、管、坠、玦、瑗、璜、琮、璧、觚、蝉等不同种类。^⑪这表明原始先民对于不同的使用价值与欣赏价值有了很充分的认识。

又如陶器等器皿上的纹饰也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多样性观念。其中像黄河流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上,绘有鸟纹、鱼纹、蛙纹、蝌蚪纹、桃叶纹、草叶纹、水波纹、漩涡纹;长江流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的陶器上,则绘有绳纹、篮纹、堆纹、弦纹、圆窝纹、刻点纹。^⑫而图纹的多样性又是对现实多样性的一种反映。

也正是在描绘过程中,复杂的抽象图形渐渐形成了。据有的学者考察,在半坡出土的彩陶上就包括有折线、平行线、三角形、菱形、长方形等图形,其中三角形又可细分为任意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等^⑬。可以这样说,大量复杂的抽象图形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先民对于具有本质意义的多样性有了把握。

再如对于音律的认识。在山西省万泉县荆村和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出土的陶埙分别能吹出后世五声音阶中的三个骨干音和四个骨干音,而近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发现的骨笛则能吹奏七声音阶。^⑭

由上述考察不难看出,早在三代之前,多样性观念已经开始广泛萌生了,而这些正是商周时期以五行为代表的多样性观念的雏型。

二、两极性或对立性观念的萌芽

上述这样一种分析和判断同样也适用于对中国人关于两极性观念的考察。

按照目前的通见,两极性观念同样产生于商周时期,例如《易经》中的“—”“--”符号,这被

^⑩ 列维·斯特劳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清晰地指出原始人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可能性和精确性,其中一例就是多贡人把植物分成 22 个主科,当中一些又继续分成 11 个子类。列维·斯特劳指出:“如果人种学家认为原始人简单和粗陋,这样就会在很多情况下使人种学研究忽略复杂而首尾连贯的、有意识的社会系统。”见《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47、49 页。

^⑪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有关条目。

^⑫ 同前。

^⑬ 见李迪:《中国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2、13 页。

^⑭ 《中华文明史》第 1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340—342 页。

视作是中国哲学中两极性观念诞生的标志。除此之外,伯阳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⑭ 史墨说:“物生有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耦。”^⑮ 晏婴说:“清浊、大小、短长、疾徐,……以相济也。”^⑯ 这些都普遍被认为是两极性观念的最早形态。然而,这些定见同样是存在着问题的。

中国人有关两极性的观念同样产生得很早,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经常会看到一些两极特征十分明显的自然现象。例如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每天傍晚在西方落下。对这样一种日循一日现象的反复观察,原始人便至少可以产生两对两极性的观念:日出之后为昼,日落之后为夜;日出之所为东,日落之所为西。并且太阳给人以温暖,这实际也是和一些具体的两极性观念紧密联系的,这包括白昼温暖,黑夜寒冷;面阳温暖,背阴寒冷等等。月亮也是如此,它高高挂在夜空,却又每天改变自己的面貌。对于月亮的这种盈亏圆缺现象,原始人肯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给予注意,而其结果便是产生了朔望月这个概念。类似现象还有许多,如季节之寒暑,草木之荣枯这样一些观念应当在采集和渔猎的年代就已经建立,旱丽的观念在农耕时代到来后也应该建立,燥湿观念是定居出现之后的一种必然思考。盛衰观念则又可能是原始医疗活动对生命现象的一种总结。

可以这样说,自然现象中的两极对立现象是两极性观念产生的天然酵母。一般而言,所有民族或文明对此都会有所认识,但却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或文明都可能发展这种认识。发展这种认识还必须具有追加条件。发达的农业很可能是这种追加条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在追加条件之下,两极性观念不仅被强化记忆,而且被强化概括,更被强化发展。因此我们看到,两极性观念(包括思维)在中国被发展了起来,而在大多数其它文明那里却没有获得发展。当然,这样一种发展也包括了中国这一主体的着意追求和开发。

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原始先民所从事的极其丰富的制作活动对于两极性观念的建立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以下选择若干方面加以考察。

如70年代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一种斧状物,考古工作者最终鉴定其为石楔。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知道斧和楔这样两种工具的不同工作原理,即斧的刃部要足够的利,背部也相对较薄,主要作用于劈,而楔的刃部却可稍钝,背部则要足够的厚,主要作用于裁^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利钝、厚薄两对观念。此外,如中原地区广泛使用蚌镰同样是对利钝现象的深刻认识,而龙山文化陶器壁的蛋壳化趋势则是厚薄观念的明显反映。

原始先民进入定居之后,建筑便成了生活中的一个极为平常的内容,同时也因此产生了许多相应的对立观念,燥湿就是其中之一。在北方,为了防潮,主要采取两种方法,第一是地面涂层或灰面,以秦安大地湾遗址最为典型;第二是地面夯筑,龙山文化中后期开始出现。这些均与燥湿观念密不可分。南方以河姆渡为代表的干栏式建筑在相当意义上也蕴含了这一观念。当然,建筑活动还包含了许多对应观念,如粗细(支柱)、深浅(地基)、高低(房屋)等等。^⑱

制陶是原始先民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从整个制陶活动的发展能够看出其与两极观念的密切联系。例如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慢轮和快轮先后被发明了,由此,快与慢这一对观念必然会

^⑭ 《国语·周语》。

^⑮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⑯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⑰ 参见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中《论石楔及扁铲》一文。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⑱ 参考周星,《黄河流域的史前住宅形式及其发展》。见《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伴随而至。又如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窑火道和火眼都较少,而龙山文化时期却很多,多和少这一对观念显然已为人们所关注。还有烧造温度,尽管从裴李岗到仰韶再到龙山,整个烧造温度并无太大变化,但事实上,每一次烧造都与温度的高低密切相关^②。

又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已普遍使用了纺轮来进行纺纱。一般而言,纺轮外径较大,重量较重时,则其转动惯量也就较大;而纺轮外径较小,重量较轻时,则其转动惯量也就较轻。转动惯量大宜于纺制刚度较大的粗硬纤维,成纱亦较粗;转动惯量小宜于纺制刚度较小的柔软纤维,成纱亦较细。而在这一活动中,原始先民接触和使用了多对对立观念,包括大小、轻重、快慢、粗细等等。^③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长短(箭杆的制作)、多少(数目的计算)、高低(音律的分辩)等等。总之,中国哲学的两极性观念在这时肯定已经取得了它的最原始形态。

三、人与自然关系观念的萌芽

随着原始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终于被提了出来,而促使这一观念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即是耕稼活动。

1979年,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马耳峰南麓的将军崖,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石刻岩画,上面刻有各种星云、植物和人面图形,其中星云图内有太阳、月亮和北斗的图形,植物多绘作成幅射状的禾苗图形。植物通常用一根线与人面图形相连,故有学者指出,这“显然是为了表示人类对庄稼和土地的依赖。”^④不过从整个岩画内容来看,依赖似还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对农作物的依赖上,而是还包括人类、农作物与天即自然之间。这样一种状况实际可能正是人与自然关系观念以及古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人关系思想的最初萌芽。^⑤

上述这样一种观念在历法中得到更清晰的反映。关于我国史前时代先民运用历法的情况,目前尚不能提供足够的考古证明资料。不过民族学的研究向我们显示:历法特别是作为最初的原始物候历肯定是史前或即原始社会的产物。依据这一点,我们完全有可能对古代中国一些文献资料的年代重新给予解释,其中尤以《夏小正》为重要^⑥。《夏小正》中人与自然对应的观念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其正月的物候是:“启蛰,雁北乡,雉震响,鱼涉负冰,田鼠出,獭祭鱼。”气象是“时有俊风,寒日淅冻涂。”农事活动则是“农率均田。”又如其七月的物候是:“秀萑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萍。”气象是“时有霖雨”。农事活动则是“灌荼。”^⑦在这里,人也即农事活动始终是和包括物候,气象以及天象在内的自然结合在一起加以思考的。可以说,人与自然相关的意识一目了然,而其最突出的就是宜时观念的确立,即农事需视季节而定,同时,历法特别是物候历的

② 参见《中华文明史》第1卷,其中第四章,第二节制陶技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③ 参见陈维祺等:《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中有关内容。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④ 李洪甫:《江苏连云港将军崖石刻与原始农业》、《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第76页,农业出版社。

⑤ 类似的观念在其它遗迹中也有所体现,如西水坡墓葬的摆塑就是一例。参见史道祥、陆翔云:《西水坡三组摆塑综考》,其中讲:“西水坡三组摆塑为我们清楚地勾勒出仰韶文化晚期原始天人关系的画面。”《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⑥ 判断《夏小正》为夏代遗存,乃是依据对其中星象年代的推算,但是相关的研究表明,对于物候的经验把握比之对于星象的详实纪录要早得多。

⑦ 《吕氏春秋》中亦有类似记载,如《孟春纪》说:“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域内或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普遍采用此种方法,如《太平寰宇记·儋州风俗》记载海南黎人即“占蓂莪之熟,记天文之季”;《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北方乌桓人乃“见鸟兽乳以别四季。”

充分运用,也发展起了这样一种意识,即注重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联系。历史表明,这样一种意识在日后的中国思维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历法探索包含了深刻的宜时观念的话,那么建筑活动对于宜地观念的产生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而这又特别体现在以河姆渡为代表的南方的干栏式建筑中。关于干栏式建筑的合理性,古人已经有过许多解释,如《韩非子·五蠹》中说:“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构木为巢,以避众害。”《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南平僚传》中说:“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归结起廓炒,干栏式建筑的意义可能有这样几点:第一,防潮,特别是南方地区的水患;第二,防止有害蒸气;第三,防止有害昆虫和动物。不难看出,这样一些意识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人与自然对应的观念。除此之外,在北方,居住形式由半地穴经浅地穴到平台再到高台,这一历程固然主要是建筑技术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也包含了对潮湿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总之,原始先民的建筑活动实际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人与自然相关的观念,反映出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或者说,建筑也不是一种孤立的活动,而是一种必须将人与自然诸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综合性活动。

人与自然相关的观念还通过原始导引这一养生活动体现出来。远古时期,原始先民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正所谓“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阨塞,四渎壅闭。”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先民们普遍患有肌肤凝滑,关节不利的疾症。如“阴康氏时,水湫不疏,江不行其原,阴凝而易闷,人既郁于内,腠理滞着而多重髓。”^②又如“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阨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③在漫长的生存实践中,人们逐渐懂得某些舞蹈动作对于解除关节凝滞,恢复人体健康有着积极的意义,于是阴康氏便“教人引舞以利导之,”陶唐氏也由此“作舞以宣导之。”这里所谓“利导”和“宣导”实际就是导引的最初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原始先民的这些导引之舞多为模仿动物姿态而成,如“吹响吁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④。“熊经鸟伸,兔浴猿蹻,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⑤原始先民为何要模仿动物来作导引之舞呢?这里就包括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有学者指出,先民在漫长的生存过程中留意到两个十分重要的现象,第一是动物的矫健,如鹰、虎之类,第二是动物的长寿,如龟、鹤之类^⑥。在同样的环境中生活,人偏疾缠身,每每天折,而动物却生机勃勃,享年甚久。羡慕之余,先民们便萌生了模仿动物作导引之舞的想法。而在这样一种模仿之中,原始先民对于人与自然相关的思考又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先民的模仿活动已经包含了一种最为初始的比类意识。换言之,原始人对于相似性的意义已经有了了解。基于这种相似性,他们能够对某些现象和原则进行比较式推延。不仅导引,在后世的思维活动中,比类意识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相关这一观念的出现向我们表明,史前社会的先民这时已经使他们也即人从一个混沌的自然界中分离了出来,人已经产生了一种将本身区别于外界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作为认识的主体已经形成了。而当人还处于自然状态也即仍以原始的采集、渔猎以及穴居为主要的生存方式时,主体意识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中国的原始先民们并没有将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从一开始,他们就和自然保持着一种特有的亲近,诸如物候知识和

② 《路史》前纪卷九。

③ 《吕氏春秋·古乐》。

④ 《庄子·刻意》。

⑤ 《淮南子·精神训》。


⑥ 参见张荣明:《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35页。

导引实践的充分发展都是这种亲近的鲜明例证,并且也是人与自然观念进一步巩固和扩张的有力支点。原始中国人一方面使自己区别于自然,另一方面又使自己联结于自然,这样一种观念范式对以后中国哲学思想的独特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涉及宇宙本质属性的哲学萌芽

为了较好地讨论本节内容,这里有必要先来认真考察一下早期中国人眼中的宇宙图景。

1972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绘有纹饰的彩陶片。先后两次G14年代测定显示,这些遗物的年代距今为 5040 ± 100 年和 4500 ± 100 年。也即是说,它们大约距今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彩陶片上的纹饰有相当一部分与天象观察相关,其中有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等等,而所有这些都透露出极其明显的知识特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陶片上还绘有这样一种图象: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外边,绘着对称的内向弧形带,弧带皆作图点,其外沿又绘放射的光芒。考古学者以为这种图象当是对日晕的记录^①。

随着观察的进一步深入,先民们又竭力去了解天体运行的复杂规律。确定季节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1963年,英国天文学家G·S·霍金斯对位于索尔兹伯里以北的巨石阵进行测算,结果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座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根据太阳方位以定季节的天文台。受此启发,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也在山东莒县发现了类似的观测方式。根据出土陶尊上图案的提示,从一块确定的石头望向东边的山峦,当早晨太阳从中间山峰峰顶出现的时候,就正好是春分。文献记载在这方面似更为详细。如《鹖冠子》中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北斗南指,天下皆夏;……”原始人也许早就注意到了可以利用北斗星斗柄指向来确定季节的方法^②。又《国语·楚语》中说颡顛“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左传·襄公九年》也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这表明中国人很早就开始注意对大火星进行专门观察。之后,最初历的历法便产生了。我们知道,夏王朝的帝王中已有用天干命名的,如“孔甲”、“胤甲”、“履癸”等,因此,天干纪日方法的发明不应晚于夏代。^③

大量深入的天象观察和历法记算还极有可能导致某些早期的天文学思想的诞生。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一座仰韶时期墓葬(45号墓),墓穴南部呈圆形,北部呈方形,墓主葬卧方向为首南足北。同时在墓主人骨架的左右两侧发现有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有人认为这些现象向我们展示了仰韶时期的原始先民可能已具有某些天文学思想的萌芽。这表现在:首先,墓主的葬卧方向是首南足北,而墓穴恰恰又是南圆北方。这显然与古代中国的这样一个观念相吻合:即天圆地方,且天南地北,对墓穴实际尺寸的计算表明,其盖图意识十分明显,“盖图所表示的分至日的昼夜关系非常合理,特别是春秋分日道,其昼夜关系的准确程度

^① 这种观察并不孤立。如60年代,考古工作者也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发掘出一批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其中有一件画的是只飞鸟驮着一轮红日,考古工作者指出,这是对太阳黑子的记录,并且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有关太阳黑子的记录。在中国古代,有关于太阳和金乌的神话传说,天文学家普遍认为,金乌实际就是太阳黑子现象。

^② 在大河村出土的一片泥质红陶片上,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圆点,其由直线和曲线连接而成。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北斗星尾部的形象写照。

^③ 又《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一则神话传说: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这被认为可能就是天干记日法的反映。同样,《大荒西经》中又说帝俊的另一位夫人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这可能是对一年有12个月的历法概念的反映,参见《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215页,217页。

简直不差分毫。”因此，这一墓穴的形状极有可能就是盖天宇宙理论的起源，它在于向人们说明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以及春秋分日的标准天象等一整套最初始的宇宙理论。其次，即是墓主人骨架两侧摆塑的龙虎图案很可能意味着二十八宿思想的起源。古代中国习惯将二十八宿划为分为四宫，每宫七宿。若将西水坡墓穴的蚌塑摆置与曾侯乙墓中的冻箱图案作比较，便会发现它们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它们都只有龙和虎和图案。同时，在墓穴北侧有蚌塑三角形图案，且紧接该图案的东侧横置着两根人的胫骨。研究者认为，这正是北斗的图案，而这进一步增加了关于龙虎摆塑作为二宫设想的合理性。^④

以上所举只是同类材料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考察我们可以获得若干耐人寻味的消息。

第一，导致无神倾向的植栽。众所周知，中国神话谱系远不如希腊那样完整和系统，对此人们曾作过种种推测。新的考察表明：在史前期就逐步建立起来的科学观察传统可能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先民对于天象的大量观察，对于天体运行规律的缜密探索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无神倾向的产生，这就造成了神话在哺乳期的营养不良。可以这样说，早期希腊人由于没有丰富的天文知识，于是便不得不诉诸于主观猜测，而早期中国人由于获得了足够的客观解释，因此神话假说便被搁置在一边。^⑤

第二，与此相关，由于具象性质的神祇并不活跃，因此，抽象意义的天命就有可能发展。在古代社会的宗教形态中，中国的天命观念显得非常独特，也显得异常早熟。然而，它恰恰可能是以农业文明为标志的古代社会的最典型最成熟的形态，世界宗教的一神化趋势在部分意义上证实了这一点。较之神祇来说，天命观念更多地包含了一种对自然法则的敬畏，而这也是和特定的天象观察相关的。宗教观念同样不可能脱离既成的知识背景。在天命观念之中，容纳了对天体运行规律的一般理解。

第三，进一步地，对天象变化、天体规律的客观观察及其传统又为自然天道观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资料来源。自然天道观的来源有二，其一是对天命观念的批判继承，其二是对科学观察的理论提炼。通常我们认为自然天道观起源于西周末年对于天命观念的否定。但如果我们充分注意新提供的考古资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一观念的发生过程可能还要漫长得多，同时，也可明了这一古代哲学十分独特的思想在中国发生的必然。当然，不用怀疑，抽象层面的天命观念的出现对于自然天道观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总之，对于天象及其规律的观察和探索不应仅仅认为只具有科学的意义或性质，在它之中实际上也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发生的消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发生问题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由于已被给予新的知识背景和条件，如考古学研究资料，民族学研究资料，以及经重新认识的文献资料，我们完全有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解释，这其中包括参照标准的重新设定。勿需怀疑，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考察方式将会有助于这一工作的顺利展开。

^④ 以上见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 年第 3 期。

^⑤ 早期中国人之所以能建立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与成熟的农业文明密切相关，而希腊人真正的天文学知识是在航海时代到来后才建立起来的。